

中国

6 前进中的曲折 / 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队伍建设

当代 出版 史料



大象出版社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 编

1949 ▶ 1999

中国

 前进中的曲折 / 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队伍建设

当代 出版 史料

1949 ▶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应高等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1999.9

ISBN 7-5347-2364-7

I. 中… II. 宋… III. 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949~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69 号

第六卷

责任编辑 张焕斌

大象出版社出版(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325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全套(共 8 卷)定价 275.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 规划座谈会的报告

周总理
看了
一下
这个
报告

国务院：

经国务院批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七日，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福建、广东、湖北、陕西、四川等十三个省、市的文教、出版部门负责人同志，有关高等院校负责

小平
阅

3 ►周总理对出版工作所批的最后一份文件(1975年8月21日)



4 ►新时期以来出版的部分出版编辑类期刊



5 ►由中国编辑学会等在南京召开的编辑史、出版史研讨会开幕式
(1999年3月)



6 ►由教育部、新闻出版署主持的第五次全国高校编辑专业联席会议暨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3月在河南大学召开

目 录

前进中的曲折

一、“左”倾思想对出版工作的影响

出版工作者应该认真参加《武训传》的讨论…………… (3)

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 《人民文学》编辑部(4)

我与《说说唱唱》…………… 赵树理(11)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

错误的检讨》…………… (13)

我们的检讨…………… (17)

质问《文艺报》编者…………… 袁水拍(31)

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的错误…………… 冯雪峰(35)

回忆与思考

——初进中南海…………… 黎 之(39)

关于古典文学作品出版工作问题

——康生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封信…………… (55)

二、揭批“四人帮”摧残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对出版事业的摧残和破坏…………… 方厚枢(60)

颠倒黑白的诬蔑 义正辞严的批驳…………… 方厚枢(69)

拨乱反正 多出好书

——把被“四人帮”搞乱的出版路线是非纠

正过来…………… 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81)

极“左”思潮在出版工作中的一些表现…………… 宋木文(92)

清理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宋木文(100)
《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 的阴谋……………	《历史研究》编辑部(108)
“古为帮用”的恶劣表演 ——清算《学习与批判》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 ……………	樊树志 王庆余(115)
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	陈石之(128)
“四人帮”是怎样利用五种艺术期刊搞阴谋文 艺的……………	《人民电影》、《人民戏剧》、 《人民音乐》、《美术》、《舞蹈》编辑部批判组……………
	(142)
《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	《人民文学》编辑部(151)
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被“四人帮”扼杀 经过……………	邢方群(155)
《三家村札记》出版后记……………	廖沫沙(159)
正在飘逸而去的往事 ——编印《革命诗抄》、《四五诗选》的前前 后后……………	王学彦(165)
鲁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	叶淑穗(177)
《战斗的青春》出版的前前后后……………	刘 金(181)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 ——回忆拙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 义传播》一书的遭遇……………	丁守和(188)
小说《刘志丹》案述评……………	魏新生(203)
萧也牧之死……………	张 羽(214)
编辑的忏悔……………	韦君宜(233)
三、克服软弱涣散,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批评“两个凡是” 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胡乔木(240)

- 出版界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自由化…………… 袁 亮(248)
20年前的一次交锋…………… 《中国青年》编辑部(253)

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队伍建设

一、编辑学研究及编辑专业教育

- 关于编辑学和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 胡乔木(267)
在叶圣陶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268)
编辑工作是一门学问
——《新闻通讯与报刊言论的写作》序…………… 熊 复(271)
20世纪中国编辑学研究…………… 邵益文(275)
我国的编辑学理论研究…………… 王华良(327)
新中国出版教育简述…………… 魏玉山(337)
中国出版专业教育10年概况…………… 萧东发(350)

二、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 重视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 卢玉忆(359)
推进人才培养工程 造就跨世纪出版人才…………… 桂晓风(364)
编辑琐议…………… 苏双碧(376)
多读书 爱交游 勤动笔
——同青年编辑谈编辑工作…………… 戴文葆(382)
编辑人员的博与专…………… 王忍之(394)
编辑的社会职责和自我修养…………… 陈 原(408)

前进中的曲折

一、“左”倾思想对出版工作的影响

出版工作者应该 认真参加《武训传》的讨论

我们出版工作者应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积极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且要在这个讨论中达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进出版物质量的目的。

我们的出版界曾经出版了若干种宣传武训的有害的书籍。其中有电影剧本、有连环图画、有章回小说、有传记。这些书籍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武训备极赞扬，誉之为“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誉之为“勤劳、勇敢、智慧的化身”，甚至誉之为“为无产阶级而生，为无产阶级而死”。我们对于这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书籍，不但没有及时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而且还曾加以推荐，足见我们没有起码的政治警觉性，思想水平太低，应当认真检讨。

参加《武训传》的讨论，正是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武训传》的讨论中，可以提高我们的政治认识，可以使我们辨别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在中国近百年史中，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推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就叫做革命；反之，就叫做反革命。从《武训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许多人在武

训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在《武训传》的讨论中,可以学习如何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可以使我们学会区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假象的东西。在对于武训的认识上,不少人把本质的东西曲解阉割,把假象的东西夸大粉饰,因而把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当作“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

在《武训传》的讨论中,可以使我们学习掌握评判历史人物的尺度。对于历史人物,在评判他的历史地位时,是根据他的私生活中的片段材料呢,还是根据他的行为与思想所给予社会的影响呢?对武训生平的批判是一块试金石,谁掌握了历史唯物论谁就能掌握住真理,谁忘记了历史唯物论,谁就只能做封建思想的俘虏。

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对于今后的出版工作是有决定的意义的,《武训传》的讨论如果学得彻底,我们今后出版物的思想水平便能提高一步。

(原载 1951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书报评论专栏文章)

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人民文学》编辑部

这次全国文联发起的文艺整风学习对我们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拥护这次学习,重视这次学习,并决心把这次学习当作总结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定我们的刊物的正确方向的一个起点。

文艺刊物是教育群众的有力的工具,文艺的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作,而首先是一种思想工作。每一个编辑部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编辑自己的刊物,按照自己的观点来选择稿件,修改稿件,而且也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编排稿件,使这些稿件成为一个

整体,成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包含着一个统一思想的刊物。毫无疑问的,编辑工作者正是通过按照自己的观点编辑的刊物来教育读者。编辑人员思想的性质是直接决定刊物的性质的。如果一个编辑的思想错误,他也便不可能带给读者以内容正确无误的读物,便难免把读者引入迷途。同样的,编者的思想越正确,越能掌握文艺运动正确的方向,便越能编辑正确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刊物,便越能正确地教育读者,正确地把文艺运动推向前进。

什么是正确的文艺刊物,目前中国的文艺刊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文艺刊物呢?

正确的文艺刊物,目前中国需要的文艺刊物,应该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忠实的实践者,应该是准确地实现工人阶级的文艺政策的有力的工具,它应该保证自己的一切工作都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一分钟也不应该离开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教育读者,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其他阶级的思想面貌;同时,这样的刊物必须经常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使刊物成为团结作家,帮助作家参加生活和进行写作的有力的工具;此外,这样的刊物还应该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大胆地揭露和批评自己工作的缺点,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那么,应该说,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是做得很不够,并且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

《人民文学》过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在创刊以来两年多期间,它发表了一些优秀的和较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全国意义,和新中国其他优秀的作品一起,标志着近几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水平;《人民文学》拥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读者和作者,而且这个数目是在逐渐发展,这表明这个刊物有着一定的群众联系。《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也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帮

助作者修改稿件,对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创作计划提出改进的意见。但《人民文学》过去的工作却存在着一个根本缺点,这就是它没有实现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因而也未能完全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还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便曾经说过:“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对于这点,在实际工作中证明我们的认识是不够明确,不够坚定,因而许多时候是被忘掉了的。而这点,正是《人民文学》的所以一直缺乏鲜明的色彩,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缺乏足够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缺乏和群众足够的联系,缺乏足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我们在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观念,我们的编辑工作便不可能有鲜明的色彩,不可能有明确的战斗目标,不可能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我们便容易在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上表现思想界限不清,便容易对于那些反动的错误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掉了警惕,失掉了辨别的能力,而让那些反动的错误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文学领域里自由存在甚至侵蚀我们的刊物。应该承认的是,虽然我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指导刊物的工作,但过去,我们对于因为全国解放而带来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复杂的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是十分不够的。我们没有估计到,正是由于全国解放,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可能以他们的观点带到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中来,并且实际上和工人阶级争夺对文艺的领导权;我们也没有估计到,一部分在老解放区实行过或坚持过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者在新的环境下可能发生动摇。正是由于我们思想上的麻痹,加上我们本来思想上的缺点,便使得我们的刊物在两年多的过程中很少积极地组织和参加文艺的思想斗争,很少严肃认真地用工人阶级

的思想去批判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就像全国各方面对于《武训传》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作品实行严正的热烈的批判的过程中，《人民文学》也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种对于文艺思想斗争的忽视便使得这个全国性的文学指导刊物未能站在文艺思想战线的前列，未能完满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和指导作用，而且不但这样，我们的刊物还发表过不少思想错误的作品，这主要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方纪），《改造》（秦兆阳），《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血战天门顶》（白刃），《老工人郭福山》（丁克辛）等等。所有这些作品，如读者和文艺界指出过的，表现了作者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因而歪曲了生活，但我们发表这些作品时，却未能发现这些作品所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或者个别作品的问题被发现了（如《老工人郭福山》）也未能在编辑部内部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和论争，这便使得这些作品在我们负责编辑的刊物上出现，并且因此在群众中间造成各种程度的思想的混乱。

正因为我们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因而《人民文学》在实际工作中和群众的联系也是不够明确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人民文学》这个刊物的对象是谁，应该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的。一个文学刊物，它不但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文艺政策的宣传者，同时还应该是国内文学创作与文学运动的组织者，但首先，《人民文学》和广大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便缺乏广泛的经常的联系，对于他们在实际工作和文学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心，很少在刊物上提出当前的问题来研究和讨论，这样，便不可能使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不可能使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把《人民文学》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人民文学》在编辑工作中虽然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提出意见和帮助他们修改原稿，虽然在刊物上用了大部分篇幅来发表青年作者以及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且和这些作者有着或有过一定的

联系,但是这种工作还不是系统的、主动的和有计划的,因而也就未能通过刊物,教育和培养出一批青年作家;其次,《人民文学》虽然也发表了一些直接来自工农的作品,但其数量还是很少的,经常性也是不够的,这样,便使得我们发表群众创作未能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的重要的方面。

正因为我们许多时候缺少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观念,没有明确的战斗目标,以及思想界限不清,因而,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关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北京《人民日报》及读者、《文艺报》以及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曾有过不少正确的批评,但我们却很少足够认真的考虑和勇敢的接受。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这样的作品,直到北京《人民日报》提出了公开尖锐的批评,并且上级领导机关建议我们转载这篇批评的时候,我们还在按语上说,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我们看稿时是疏忽了的”。对于《老工人郭福山》这样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作品,在别人已经公开批评以后,我们也同样地认为发表这样的作品只是一个“疏忽”。当然,对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曾作过一些正式的检讨,例如第一卷终了、第二卷开始时我们便发表了一篇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工作”的文章。但像这样的检讨是不深入的,它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性质并未能作出适当的结论,对自己错误和缺点发生的原因也并未作任何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笼统地说是“政治水平不高,业务钻研还很不够”。事实证明,这样的检讨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编辑工作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如大家所知道的,自从第二卷开始以后,新的错误的作品又接连在刊物上出现。而且,也正由于我们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发生错误的原因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后我们对于别人的正确的批评也很少勇敢的接受,我们中间有许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有的负责人员)对于批评有时甚至采取怀疑、轻视和抵抗的态度。当然,在我们中间,关于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并不是没有争论的。但这种